

先生

《先生》编写组 编著

蔡元培

胡适

马相伯

张伯苓

梅贻琦

竺可桢

晏阳初

陶行知

梁漱溟

陈寅恪

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卷隽永。

他们的背影，我们民族的正面。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先生

《先生》编写组 编著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生 / 《先生》编写组编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086-3443-2

I. ①先… II. ①先…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7731 号

先生

XIANSHENG

编 著: 《先生》编写组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盈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443-2 /K 233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序

那些背影，
一个民族的正面

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如果说民国是最近的春秋，先生犹如华夏的背影，渐行渐远。

“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初看是喜语，再看是痛语，再再看，或看出旷达。

民国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纵有诸多称呼，我觉得终不及“先生”二字来得亲近且大气，可以俯身可以仰望。这在当下虽是个加上姓氏就被常呼的字眼，却又是个能遥想到鞠躬的场景。先生，几千年的敬语，被冬烘过，也被秋杀过。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这代人上小学时，私塾和学堂已远，戒尺和鞠躬已远，破四旧里，先生落魄；三十年后的市场化中，先生贬值或被作价。教育大景，江河日下入大坝，蓝天白云走黄沙。值此时辰，我们勉力拍摄一部回溯民国先生的十集纪录片，共鸣了许多人——那

些与先生们隔代不相逢的学生们。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纪录片《先生》聚焦民国国家讲坛上的大家身影，以最负盛名的近现代教育家为主角，揭示中国教育的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梳理中国教育百年间的重大事件、观念嬗变，旨在溯源问脉，固本图新。《先生》的遴选标准为：开一代风气的教育启蒙者；性情、经历、作为有传奇性；对当代教育具有参照和启迪。头十集选定的十位人物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也曾身为学生，唯理想至老不灭，或者说破灭一次，再理想一次。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烽火连天的战乱守拙、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他们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先生》系列纪录片力图以先生般的个性制作，映现先生的贴近群伦又卓尔不群。历史影像，情景回放，当事者言，后来者说，今昔穿插，盛衰互鉴。但为今日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余音袅袅里是千年前范仲淹先生的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他们将苦难化作光明的文字，用背影证明民族的正面。

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部纪录片，如今又呈现出一本书。这本书的文字渊源，汇纳百川。为拍《先生》纪录片，深圳越众影视公司先请傅国涌、张冠生、余世存、熊培云、蔡朝阳等作家撰写文字脚本，随后有钱喻、高小龙、马莉、王韧等导演撰写各自执导的拍摄脚本，再后来成片时，《新周刊》杂志社的封新城、何树青、周可、丁晓洁等诸君，又作了杂志版的《先生》封面故事，

并请一批作者充实了相关文章。在此前后，有几家出版社欲结集出版，我心想这是各种文字、影像、客观、主观的集合混搭，出书实在太难。经不住中信出版社编辑们的恳切执著，我终将全部资料交由他们处理，遂有编写组的署名，以示集体之力。为赶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先生回来》平面展暨纪录片《先生》的电视首播，又请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编辑出版。至此，先生们的意态神韵，跃然纸上。这实为偶然中的必然，寒境中的暖境：“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年轻就是不老，其实，老的也能年轻。

黄昏时分，群鸦归巢，晚霞满天。有人在远方忧伤。永不相逢的故人年代，似近尤远，似远犹近。如果这世上还有怅恨，已经百年。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

邓康延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于深圳



▲ 1947年4月27日，北平。清华大学36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右二）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右一）合影留念。（图/POTOE）

前言

100年来 影响了中国的 先生们

先生们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
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日中国之崛起，若言是全体国民之力，则此力之肇始，非在近年，乃在百年以前。百年以来国民救亡图存意志不竭不息，方有百年中国历艰难困苦终于巍然屹立。而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

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识让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年代，先生们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先生，也许是小学教员，也许是大学教授，也许是躲在课本背

后的无名英雄。先生，也许是学术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也许小节有亏，但大节不乱。先生，纵你已成人，他已过世，他仍对你有影响，你仍尊其为先生。

范仲淹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百年看先生，徒见其背影；国家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

20 世纪的先生来了

19 世纪行将结束时，科举考试未废，私塾、官学、国子监、书院俱在。彼时，中国还有上百所教会学校，还有着重外语、军事和技术实业的 30 余所洋务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指导着 1872 年由容闳率领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接受教育的内容。1872 年 8 月 11 日起分 4 年 4 批赴美的 120 名幼童，没有完成 15 年的学习计划，就在 1881 年因政府的守旧而被撤回国（实际回国 94 人），其中包括后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另有 3 批共 87 名留欧学生，从 1879 年起陆续完成军事与制造学业归国，其中包括严复。

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思潮和维新运动兴起，康有为在广州开万木草堂，其学生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任分教习），盛宣怀在天津开中西学堂、在上海设南洋公学。康梁谭办校、办报、办学会、参与变法、倡废科举和设新学堂，与严复等共同成为 20 世纪开启近代中国民智的中国先生。

谭嗣同，这位感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和民本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的先生，在 1898 年变法失败而有机会出国避难之际，说的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

起。”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而之后“有心杀贼”的国民远超千万人，包括谭嗣同的“粉丝”蔡元培。1902 年身为民间“中国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负责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暗中教男生制炸弹、教女生学暗杀，后来学生多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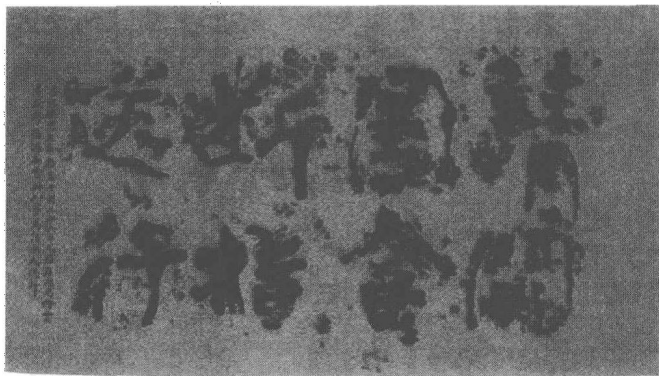
康有为，这位“公车上书”后力推“百日维新”的知识分子，在 1902 年写就的《大同书》中，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的完整教育体系：母亲怀孕进入本院接受胎教，婴儿断乳之后进育婴院，3 岁后再进慈幼院，6 岁~11 岁进小学院，11 岁~15 岁进中学院，16 岁以后进大学院，强调男女入学资格和毕业出路平等。他和他的学生以及读者，都成了国家进步的推手。

梁启超，这位“百科全书式”的维新首领，笔耕不止，为“兴民权”而“开民智”，倡导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期待教育出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国民——“新民”。

严复，这位中国第一代英国“海归”，除了在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更以《天演论》等“严译八种”传播西学于后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除了“信达雅”的翻译三字论，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育论更令他成为中国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11 年后的 1906 年，王国维首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

1906 年，自隋代起实行了 1300 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同年在日留学生已达 8000 名以上，包括鲁迅。1909 年，全国 5000 多所新式学堂里，在校学生超过 160 万人，同年“庚款兴学”遣派留美学生计划开始实施，包括梅贻琦（次年第二批包括竺可桢、胡适、赵元任）在内的新一代的中国脊梁和中国先生，即将从新式学堂和留学生中诞生。

1909年12月8日，在湖南的请愿代表团起程前往上海与各地代表汇合，要求朝廷“速开国会，清厘财政，以保主权”之际，32岁的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徐特立，在学校演说到悲愤处，拿刀斩断左手小指，用断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让代表带去请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 徐特立断指血书。毛泽东于1937年1月20日在延安为徐特立祝寿写信道：“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图/新周刊图片库）

学生不多，先生不少

1912年~1949年，中国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也不多。有学者统计，1934年，中国共有高校108所，学生41768人，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而在2007年，中国已有2371所高校、在校生2700万人、专任教师116.83万人。

那时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不多，但先生不少。

在北大，既有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又有政治保守而国学精深的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先生。第六任校长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投考北大落选但发表过佛学文章《究元决疑论》的梁漱溟、地质学家李四光、作家莎菲、应邀从日本回国的徐悲鸿，都因此而获教席。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有教授90位，平均年龄30多岁；通过教学、发表文章和参与社会事务，他们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成为领导全国青年治学、爱国、改造社会的先生。

在清华，曹云祥校长与吴宓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执教于国学研究院；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锺书为外文系1929级学生，钱锺书入学即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梅贻琦校长与四大导师为友，延聘华罗庚，增设工学院，执掌国立西南联大时与北大和南开名师精诚团结，酿成“先生如群星闪耀”之大观。他的理论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南开先生”张伯苓创办了包括中学、大学、女中、小学、研究所的南开系列学校，并种下了中国人的奥运梦。他亲自编剧、导演、演出文明戏，学生演员包括周恩来、曹禺。他请到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名师，教出后辈声乐家。他倡导“公”、“能”教育，提倡大家都为中国的事情尽份责任，不要“你赖我，我赖你”，“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1917年，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时师从蔡元培的黄炎培，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立中华职业学校，为个人谋生，个人服务社会、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其后更办校无数，桃李满天下。黄炎培是把教育与职

业紧密相连的务实先生。

1923年，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1925年后转向乡村教育运动，服务占乡村人口90%的乡村文盲。1926年，以晏阳初任总干事的河北定县试验总结出的乡村平民教育经验在全国推广。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试图培养一批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康健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的乡村教师，然后由他们去办乡村学校，改造乡村生活。但1930年4月，学校被封闭。他们是志在改造乡村的平民先生。

除了中国先生，亦有外国先生。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好。他执掌的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京大学亦请到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名师。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司徒雷登不但没有处分学生，还召开全校大会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其深明大义如斯。

路易·艾黎，这位1927年就来到中国的新西兰人，1942年后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两年后迁至甘肃山丹县，近600名学生半工半读，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为办学思想。在此9年，他为学校经费卖过汽车，为学生温饱动用了母亲的1万美元退休金，为保护学生跟驻军争吵，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他在中国待了60年。

赵元任陪罗素在中国讲学一年，徐志摩陪泰戈尔五城演讲，杜威26个月在中国讲演200多场，燕卜苏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教书数年，这些都丰富了当时中国

先生的内涵。在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眼中，五四运动到解放前这30年，是中国大学最美的第一个时期，美在气象更新，美在人才辈出，也美在先生辈出。

“德先生”和“赛先生”

蔡元培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那时的先生们，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跟有血有肉的先生们相比，作为思想资源和社会武器的两位“先生”影响力更大更广，直到今天，即“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这两位“先生”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引进的。《新青年》云：“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先生们以不同的方式拥护和争取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将其传给一代代学生。“赛先生”在今天比“德先生”更有地位，但“德先生”也落到实处，才是国家和公众的福祉。

说到底，先生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让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真正地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美好、这个世界的尊重。

（文/何树青）